

身份认同：韩国对中韩历史的选择性叙述与中韩关系

李扬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 博士

内容提要

本文从历史文献上的中韩关系和当代韩国的民族心理塑造两个方面出发，考查了影响中韩关系发展的潜在障碍：韩国方面对中韩历史关系叙述的选择性。鉴于韩国对历史叙述的选择性达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程度，本文不得不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证实一些关键问题。尽管战略问题（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等）和经贸互动关系是中韩关系目前最为热闹的议题，但是，要真正确立长期稳定的东北亚的战略均势，必须在力量大致均衡的考量之背后，谨慎应对韩国对历史的选择性叙述问题。这是韩国民族心理形成过程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体现。由于韩国在其民族认同问题上对历史的选择性叙述，导致中国认为其东亚历史文化的话语权地位受到冲击。而韩国方面自认为其行为与中国没有关系，这就使双方的观念冲突成为必然。由于长期的历史隔阂，中国不太习惯于一个新交往的、同时又是新崛起的韩国在历史问题上与自己认识相左。在惊诧之余，中国既需要认识到韩国民族主义的来源实际上和自身的历史有直接的关系，也需要认识到自身已经卷入了韩国民族身份认同的历史进程。韩国历史叙述的选择性是隐藏在民族主义之后的深刻的民族心理问题。如果不从历史价值观上逐渐冰释双方的这些纠葛，政治家们忙于建立的东北亚战略均势则会因观念上的严重差异而动摇基础的稳定性。

关键词：中韩关系 民族心理 身份认同 历史叙述 历史悲情主义

韩国历史叙述的选择性：历史悲情主义

历史本身具有主客观性质。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但历史只有通过一定的载体才能为人所知。后者即是历史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本身就是叙述，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①正是因为历史的这种双重性质，使得历史可以并必然成为实现整合民族精神的工具。^②在确定本民族的身份和激发民族精神方面，历史叙述往往采取两种常用的手段：历史英雄主义和历史悲情主义。历史英雄主义是对历史上本民族英雄和精英以及他们创造的伟大功绩的集中叙述，用以产生历史自豪感。本文主要探讨韩国的第二种历史叙述即历史悲情主义叙述。

历史悲情主义（Historical Sentimentalism）是对历史上本民族发生的不幸、悲剧和屈辱的一种伤感的非理性的集体记忆。^③在塑造民族心理和激发民族精神方面，利用历史悲情主义进行教育，并非韩国才有，东亚国家多数因为近代史的不幸，或多或少均受这种教育观念

^① 梁启超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赅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可见，“记述”、“校”和“资鉴”皆为主观叙述和论说过程。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② 钱穆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定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钱穆所说，即隐含了对待本国历史的两种态度：充满敬意的叙述和悲观的叙述。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扉页。

^③ Sentimentalism 一词来到中国的时候，是郁达夫第一个翻译的，他把这个字译成“生的闷脱儿”，形容一种滥情的伤感情怀。郁达夫：《沉沦》，上海：泰东书局1921年版，第48页。

的影响。关键是这种思想一旦成为集体共有的意识，并贯穿决策系统的话，则会对国家的对外关系产生重大效用。在这种集体情绪中，人们会拘泥于对历史问题的片面的、选择性的记忆而不能全面正视过去，对自身的不幸历史和现在的身份过于敏感，因此也极大的影响到反观自身和观察别人的视角，从而构成现实层面的诸多问题的症结。能否走出这种情结，影响到民族心理的现代性。于韩国而言，历史悲情主义在其对外关系方面表现为任性的道德主义^①（Petulant Moralism）、受害者情结和极端民族主义。由于中国和韩国历史上的紧密关系，韩国的历史悲情主义直接对中韩关系产生极大的冲击。

韩国的历史悲情主义来自韩国与中国的特殊的历史关系、地缘政治上的夹心地位以及近代被日本殖民的历史。在现代转型时期，历史悲情就有可能以非理性的面目展现出它的力量，尤其在身份认同上体现出非理性的特征，其政治层面的体现是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结。鉴于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可能会进一步加深这些情绪，而韩国的民族心理的现代转型还需要中国方面的合理回应，也就是说，中国有意无意介入了韩国现代民族国家心理形成过程，因此，作为最重要的邻国，中国有必要正视这个问题。

一、在韩国民族国家形成和存续的叙述中弱化与中国历史的联系

一个民族形成国家的过程，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挖掘独立于其他民族的个性特征，以此辨明身份，加强民族心理认同。而民族心理认同是本民族形成的情感基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其来源问题。^②神话通常构成民族心理的源头。民族心理的内核一经形成，就自然地支配了本民族的情感和认知。

在当今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时代，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显然认识到民族心理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对国际关系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由于大多数人（无论中国人或韩国人）对“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三韩、高句丽、新罗、百济、高丽和李氏朝鲜之间的关系不清楚，由此导致韩国官方和学者在叙述历史上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和导向性。

韩国官方和学者普遍采信关于“檀君”的神话传说，作为自己民族的来源。^③这和中国有历史明确记载的“箕子朝鲜”的故事不符。韩国的这种选择性叙述，旨在剔除其民族国家形成上的他国因素，凸显本民族的主体性。

关于民族形成的神话可以通过拉大和临近民族的心理距离而加强本民族的独立性，增强民族内部的认同。“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可以有深浅强弱的不同。为了要加强团结，一个民族总是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民族的标志。还常常把长期共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喜闻乐见的风格，加以渲染宣扬，提高成民族形式，并且进

^①芝加哥大学教授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用于概括中国前些年外交思想的用语。所谓任性的道德主义，就是过去 150 年，我们饱受工业国家的侮辱、侵略，你们欠我们很多，我们是对的，你们要承认我们的立场在道德上的正确性。之后，我们才可谈论具体事务。其实，韩国在近代以来的经历使其更具有任性的道德主义情结。

^② 比如，梁启超说，研究中国历史的首要问题，是：“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抑或移民？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何如？中华民族最初之活动，以中国何部分之地为本据？何时代发展至某部分？最近是否仍进行发展，抑已停顿？外来蛮族——例如匈奴、突厥等，其与我共争此土者凡几？其来历何如？其纷争结果影响于我文化者何如？我文化之影响于彼者又何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 6 页）。

^③ 有关檀君神话的研究参见谭红梅：《〈檀君神话〉中的图腾崇拜》，《科学大众》，2007 年第 2 期；王志国：《檀君神话和弘益人间思想》，《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赵杨：《韩国和朝鲜神话研究之比较》，《东疆学刊》，2005 年第 3 期；金东勋：《揭开朝鲜神话迷宫的金钥匙——简评〈朝鲜神话研究〉》，《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3 期；张琏瑰：《檀君与政治》，《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 年第 3 期等。

行艺术加工，使人一望而知这是某某民族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民族风格。”^①

关于“檀君”的传说，韩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网站，直接将其定位韩国民族的来源。其中说道：“韩国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 2333 年。据说，韩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檀君，是天神之子与一位以熊为图腾的部落的女子所生。檀君建立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历史学家将韩国的这段早期历史阶段称为‘古朝鲜’时代”。^②

2007 年 2 月 23 日，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宣布，从当年新学期开始将采用新编初中、高中历史教科书。原教科书的叙述说“《三国遗事》和《东国通鉴》中记载，据称是檀君王俭建立了古朝鲜(公元前 2333 年)”，如今将“据称”二字去掉，成为“檀君王俭建立了古朝鲜”，从而将以神话形式记录的古朝鲜建国变成了正式的历史。

最早记述檀君神话的是高丽时代学者李承休(1224~1330 年)和僧人一然的《三国遗事》。但用古汉语撰写的有关朝鲜半岛的记载传闻稗说著作并无史料依据。而比《三国遗事》成书早 150 年的官修正史《三国史记》并没有记述檀君。

尊檀君是出于彰显民族精神以团结整合民族的需要。1910 年至 1945 朝鲜反日独立运动期间开始尊檀君，并以“檀纪某年”纪年。此间，朝鲜民族还把檀君建立国家的 10 月 3 日定为开天节，举行盛大活动祭祀檀君。1961 年朴正熙发动政变上台后，檀君纪年自 1962 年 1 月 1 日起被废除。1990 年以前，朝鲜一直主张“檀君神话说”。但七十年代以后韩国经济腾飞，滋长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导致韩国史学界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国史论争”。新兴民族主义者主张檀君为史实，应写入正史和教科书，如韩国 1990 年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国史》，其中就有“檀君和古朝鲜”一节，明确断定“古朝鲜为檀君王俭建立”。^③

直至 21 世纪初，檀君逐渐被直接以韩民族的创始人的身份被写进教科书。此段历史说明，韩国塑造民族身份的过程是伴随着国家独立、经济腾飞和历史的重新书写的。此间，必然淡化他国影响，以加强民族源头上的纯净性和独立性。^④

而真正的有记载的历史则是来自“箕子朝鲜”。韩国学者虽然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箕子，但对于是否存在箕子朝鲜，是存疑的。在 2001 年 10 月复旦大学召开的“第四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韩国西江大学校史学部教授金翰奎先生，发表论文题目为“箕子与韩国”，提出，“在传统时代韩国的历史叙述中，无论何时箕子朝鲜都被置于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史料的零碎性和不确定性”，“箕子朝鲜的存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韩国“对箕子的尊重是在韩中间政治文化关系达到高潮的情况下展开的”，他本人并不认为箕子朝鲜具有可信的历史根据。^⑤

箕子其人，自先秦至汉代的儒家经典中有广泛记载，是孔子所称的“殷末三仁”之一。箕子名胥余(约公元前 1173——公元前 1080 年)，因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爵为子，故称箕子。武王灭商建周后，命召公释放箕子，向箕子询治国之道，箕子不愿作周的顺民，带领遗老故旧一大批人从今胶州湾东渡到朝鲜，创立了箕子王朝。同去的有殷商贵族景如松、

^①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6 页。

^② 大韩民国驻中国大使馆网址：<http://china.koreanembassy.cn>

^③ 参见郑成宏：《檀君神话成事实——韩国修改历史教科书》，《世界知识》，2007 年第 11 期。

^④ 1984 年，《韩国近代史》作者姜万吉，在说到八十年代韩国民族急于了解本国历史的时候说：“我想可能是出于对自己民族的深厚感情，以及南北分裂情况下，迫切需要一部民族历史等原因，近来一般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非常关心我国的历史。为适应这种情况，已有数百种韩国史概论和数种时代史问世。”姜万吉：《韩国近代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 页。

^⑤ 参见（洛阳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洛阳中韩文化交流促进会）张京华：《箕子朝鲜时期的北方环境》，2001 年上海“第四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来源：艺术中国网，国学研究：<http://www.artx.cn/artx/guoxue/29191.html>

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

关于箕子的中文记载包括《十三经》中的《尚书》、《周易》、《论语》、《孟子》、《左传》，以及《十三经》以外的《逸周书》、《荀子》、《尚书大传》、《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和《孔子家语》等。在其他一些典籍中，如《墨子》、《尸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贾谊《新语》、刘向《新序》、王充《论衡》、桓谭《新论》、扬雄《法言》，也有记载。以后历朝史书均有记载。其中，“箕子封朝鲜”的记载，始于《逸周书》。同时，在韩国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以及其后的《三国遗事》、《帝王韵记》、《朝鲜史略》、《海东绎史》中，都有“箕子朝鲜”的记载。

《剑桥中国秦汉史》采信了箕子朝鲜的说法。“中国人和朝鲜半岛民族的接触，按传统说法开始于周王国建立时（传统说法为公元前 1122 年）。那时商王室的一个逃亡的成员名叫箕子，他逃到朝鲜，并将若干中国生活方式的特征带到那里。”^①

整个朝鲜李朝时代，朝鲜尊箕子，并以此自豪。朝鲜世宗大王十年（大明宣德三年，公元 1428 年），世宗尊其父太宗之命重修箕子庙完成，李朝文臣卞季良奉命撰《箕子庙碑》，记载说：宣德三年岁在戊申夏四月甲子，国王殿下传旨若曰：“昔周武王克殷，封殷太师于我邦，遂其不臣之志也。吾东方文物礼乐，侔拟中华，迨今二千余祀。惟箕子之教是赖。顾其祀宇隘陋，不称瞻式。我父王尝命重营。予承厥志而督之。今告成矣。宜刻诸石，以示永久。史臣其文也。”^②

二、通过混淆“高句丽”和“高丽”的历史，以确立民族国家来源的延续性

除了在韩国民族形成源头的选择性叙述外，韩国在朝鲜历史演进过程中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问题上也凸显其强烈的主观选择性。

跨越汉朝到唐朝历史的“高句丽”，发源于中国汉朝治下的东北地区。公元前 194 年，燕人卫满占王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自立为王，国号仍称朝鲜，历史上称其为“卫氏朝鲜”。公元前 108 年被汉武帝所灭。汉朝在卫氏朝鲜旧地置乐浪、临屯、玄菟和真番四郡，历史上称其为“汉四郡”。^③四郡之下设有很多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汉武帝破卫氏朝鲜后，以高句丽为县，隶属于玄菟郡。高句丽作为国号，则为公元前 37 年朱蒙建国开始有的。始分布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至吉林省集安市一带，后统治地扩展至朝鲜半岛北部。此国历史为中国学者认为是中国史之组成部分，为当代韩国学者不认同。

高句丽形成后不久，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开始由马韩、辰韩和弁韩之“三韩”部落集团，逐渐形成了百济、新罗两个奴隶制国家，它们与北部的高句丽王国并立。由于日本觊觎朝鲜半岛，导致公元 663 年中日历史上第一次战争——白江口（今锦江口）海战的爆发。中国支持新罗，日本支持百济和高句丽。唐军焚日军战船 400 余艘，百济灭亡。日本此后 900 年余不敢再觊觎朝鲜半岛，反而进入与中国最友好的时期。公元 668 年薛仁贵等灭高句丽唐朝于高句丽境分置 9 个都督府 42 州 100 县，总隶于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安东都护，统兵 2 万，驻屯平壤。其后，由于高句丽遗民常发生叛乱，唐朝将高句丽数 10 万户内迁到江淮以南及河南、陇右诸州的空旷之地，余下的小部分高句丽族众或奔突厥和渤海国，或向南奔新罗。高句丽人作为一个民族也与其他民族融合，从此在史书上销声匿迹。

以上为高句丽的简要历史。作为全面振兴中国东北战略的一部分，2002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联合主办了一项为期 5 年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由于高句丽存在的 700 年历史中，至少在公元 427 年迁都平壤之前，一直是

^① 费正清、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80 页。

^② 见《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十年夏四月甲子。本文引用之《李朝实录》参照中国首次出版的《李朝实录》全 56 册本，北图出版社 2008 年 6 月出版。

^③ 这些郡的历史可参见（日）池内宏：《满鲜史研究：上世编》，东京，1951 年版，第 3-189 页。

中国古代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的发源地是在中国吉林集安市，主要历史也在中国境内，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已于 2004 年获得了第 28 届世界遗产大会的批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所以，中国进行的研究无可厚非。

但是，由于历史上，中国至少在《明史》以前把高句丽和高句丽灭亡 250 年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混同，^①导致韩国的部分学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证明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但是，无论是从语言^②还是从政权建立、扩张的历史记载和现代考古结论而言，都已经证明二者并非继承关系，即高句丽不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2003 年 12 月 9 日，韩国古代史学会、韩国考古学会、韩国近现代史学会第 17 个学会在汉城历史博物馆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应立即停止把高句丽史编入中国历史的行为。^③

由于冷战时期特殊的政治因素，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朝两国在中国东北举行了两次联合考古，所有发掘的高句丽文物全都送给了朝鲜。这使得中国在举证方面存在一定的被动。但是，如果韩国把这一历史-考古的学术性问题引导到民族认同和边界问题上去的话，则会为双边关系带来恶果。

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边疆政权高句丽的历史归属问题，韩国方面一直穷追猛打，不放弃称高句丽是韩国历史的说法，从 2003 年一直延续到 2008 年。2008 年 2 月 12 日，韩联社报道说《纽约时报》2 月 11 日第 18 版的广告称高句丽是韩国历史。该广告刊登的是一则以《高句丽(Goguryeo)》为标题的英文广告，附上了公元 412 年高句丽占领满洲（中国东北）时的韩半岛周边地图，并称“毫无疑问，高句丽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应承认这一事实”。此广告由韩国传媒宣传专家徐庆德（34 岁）登载。此消息被中新网、铁血论坛、天涯论坛、anti-cnn 等广泛转载。广告中高句丽的面积非常大，包含了整个中国东北、内蒙古东部和河北，令人吃惊。

此外，韩国还在高句丽问题上选择性的不论及唐朝援助新罗将日本逐出朝鲜半岛的辉煌

^① 高句丽灭亡后 250 年，三韩人王建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高丽国，史称王氏高丽，朝鲜半岛第一次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高丽即汉文“高山丽水”之意，后来的英语翻译中把朝鲜叫“Korea”，即源于此。而高句丽是音译的名称，因为高句丽国家并不用汉语。并且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而不是一体相续的朝代，因为王氏高丽与高句丽领土 95% 以上不重合，语言不同，历史年代跨度过大（超过 250 年的差距），这是必须严正注意的问题。所以，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地方政权。由于王氏高丽立国于 918 年，1392 年为李氏朝鲜取代，时跨我国五代中期至明朝初期，故《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都有《高丽传》。高句丽又称为“高氏高丽”。宋代以前，史书对高句丽的历史定位是准确的，由于疆域被辽金阻隔，文献失散等等原因，宋人普遍不清楚从唐朝灭高句丽到王建建立高丽之间朝鲜半岛发生了什么事，从而形成了王氏高丽为高氏高丽继承者的错误认识。

^② 关于高句丽的语言，多数研究的欧美日语语言学家认为高句丽（包括百济）的语言更接近日语，和新罗的语言差距较大。新罗是当代朝鲜语言的来历。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白桂思 (Christopher I. Beckwith) 在其《日本·高句丽语系的民族和早期中国》一文中，阐述了有关高句丽人和日本人之关系的语言学证据。根据这些证据，他提出古代日本人（倭）和高句丽人的共同源地可能是在面向渤海的中国辽西地区；后来这个人群的一支向东越海到达日本，而过了几百年后另一支则向东北迁徙，形成了高句丽人。他们都属于一种古老的扶余语族。现在的朝鲜半岛的语言不属于这个语族。该文见：Christopher I. Beckwith, *Koguryō: The Language of Japan's Continental Relativ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Japanese-Koguryoic Languages, with a Preliminary Description of Archaic Northeastern Middle Chinese*.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 相关论述参见 *The Ethnolinguistic History of the Early Korean Peninsula Region: Japanese-Koguryoic and Other Languages in the Koguryo, Paekche, and Silla Kingdoms*. *Journal of Inner and East Asian Studies*, 2006, Vol. 2-2: 34-64. 2006. *Method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Some Recent Studies of the Early Ethnolinguistic History of Korea and Vicinity*. *Altai Hakpo* 2006, 16: 199-234.

^③ 中韩关于高句丽历史的大辩论始于 2002 年的中国东北工程，但其激化则开始于《光明日报》2003 年 6 月 24 日的文章《试论有关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章认为“高句丽政权的性质应是受中原王朝制约和地方政权管辖的古代边疆民族政权”。韩国国学界纷纷举行以高句丽历史为主题的学术大会，对抗中国的历史研究。

战果（保卫了朝鲜半岛独立国家的存续，长达 900 余年），正如下文将涉及的，韩国也极力弱化明朝万历年间中国出兵帮助朝鲜成功抗击日本丰臣秀吉侵略的历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选择性的叙述不意味着对显著的历史记载进行随意性的改变。但是，韩国可以通过这种选择性的记忆，弱化他国因素，突出本国主体。

三、朝贡体制造成的影响

中国和朝鲜半岛国家间的关系受朝贡体制影响深远。历史上的事实是，中国式的朝贡体制在实际影响上有一个不同于西方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的特质：中国不谋求占领、征服和剥削朝贡国家，相对的维护了周边弱国的体制完整和经济独立。这是由中国源自中原的礼治体系决定的。朝贡体系是中原王朝内在统治秩序的外化。其核心追求是满足道德上的优越感。^①

中国在王朝最强大统一的时期，选择了最合适的东亚独特的国际关系体系，最大限度的维护了整个体系的稳定和和平。这比同时期西方的国际体系要人道和有效得多。当然，这个体系仍然是不平等的。这的确是这个体系的缺陷。但是，我们无法超越历史的时代局限，要求古人实现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主权平等原则。

随着中原王朝的崩溃，朝贡体系解体。但其影响至今不散。其中之一就是韩国对中国的不信任和对朝贡体系的完全否定。甚至在韩美牛肉风波中，抗议的韩国民众还攻击韩国政府对美国也搞“朝贡外交”。^②韩国显然是把当年的朝贡当成了屈辱历史储存在记忆当中了。

但是，以明朝为例，朝鲜当年对中国的朝贡并非来自一种武力强制，并且，朝鲜在朝贡体系当中，得到了贸易上和国家安全上的最大好处。^③其本质上和美国对韩国半个世纪以来的保护相似，甚至美国对韩国的干涉、压制和驻军要远远坏于明朝对朝鲜李氏王朝的情况。

明朝自开国以来，即实行“国无大小”、“推诚以待”、“修礼睦邻”的和平外交政策，除了对蒙古保持军事警惕之外，明朝规定了 15 个国家均为中国的友好国家，不实行征讨政策（不征之国）。此事见《明皇祖训·首章》。祖训中朱元璋把朝鲜定位以后世代不征讨的第一个国家。“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即北元—蒙古）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迹，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今将不征诸夷国各开列于后：东北：朝鲜国即高丽。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故待之。正东偏北：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④

1392 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恭让王四年；朝鲜太祖元年）与明朝亲近的高丽大将李成桂自立为国王，由此结束了高丽王氏家族的统治。李成桂积极参与明朝的朝贡体系。半年时间内，先后九次遣使到明朝，一来解释和说明政权更替的原因，而来请求明太祖朱元

^① 韩国对“朝贡”和“属国”等历史上的这些概念非常敏感，不愿意承认这些历史。

^② 韩国民众示威的导火线是韩美 2008 年 4 月 18 日达成的对美全面开放牛肉市场协议。韩媒体当时指责这是李明博献给美国总统布什的礼物，是对美“屈辱外交”和“朝贡外交”。

^③ 事实上，中国并非所有的王朝所有的大臣都赞成朝贡体制。比如，北宋时期的苏轼就是积极主张断绝与高丽的朝贡关系的人。北宋政府曾经拟议指派苏轼出使高丽，在元丰四年至八年间(1084—1088)苏轼先后撰写《论高丽进奉状》、《乞禁商旅过外国状》、《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等公文，强调应该断绝宋与高丽的朝贡关系：“臣伏见熙宁以来，高丽人屡入朝贡，至元丰之末，十六七年间，馆待赐予之费，不可胜数。……无丝发之利，而有五害”，而“(高丽)使者所至，图画山川，购买书籍，议者以为所得赐予。大半归之契丹”。参见《苏轼文集·东坡奏议》，中华书局 1986 年版。卷六，卷八，

^④ 张德信，毛佩琦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 1995 年 7 月版，第 390 页。

璋赐予国号。按照朱元璋的旨意，改国号为朝鲜，取“朝日鲜明”之意，定都汉阳。^① 朱元璋不仅通过宣称“朕为尔正名”承认了朝鲜新的政权，而且明确提出不去直接干涉朝鲜：“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且其间事有隐曲，岂可遽信。尔礼部移文谕之，从其自为身教，果能顺天道、合人心以安东夷之民，不启边衅，则使命往来实彼国之福也”。^② 又说“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③

由于朝鲜的示好和主动，加之朱元璋的和平外交政策，朝鲜和明朝建立了具有经典意义朝贡关系。朱棣继承皇位，定都北京后，朝鲜最早派人前往南京祝贺朱棣登基。永乐元年（1403年），朝鲜太宗李远芳亲自到南京朝见永乐帝朱棣。朱棣十分高兴。永乐六年，成祖派内使黄俨等人出使朝鲜，赏赐朝鲜国王花银一万两、丝五十匹、素线罗五十匹、熟绢一百匹，作为对朝鲜国王向大明的朝廷献马的回报。朝鲜国王受宠若惊，亲自宴请明廷使者，并向使者问道：“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极也？”黄俨答道：“新登宝位，天下诸侯未有朝者。独朝鲜遣上相进贺，帝嘉其忠诚，是以厚之”。^④ 朝鲜的朝贡并不是都被接纳，这与朝鲜的积极入贡心理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也反应出这样的历史关系潜伏了导致朝鲜心理扭曲的因素。

以洪武年间为例，洪武六年，朝鲜遣使贡马五十匹，“道亡其二”。“及进，以私马足之。帝恶其不诚，却之”，送马以次充好，拒绝其进贡。洪武七年，朝鲜又遣使来贡。“表请每岁一贡，贡道从陆，由定辽，毋涉海，其贡物称‘送太府监’。中书省言：‘元时有太府监，本朝未尝有，言涉不诚’。帝命却其贡”。^⑤送东西连名称都搞错了，再一次予以拒绝。

据《明史·太祖本纪》记载，自洪武二年（外国开始朝贡）迄洪武三十年，被明王朝拒绝入贡的有四个国家，计六次。其中：朝鲜两次，日本一次，安南两次，占城一次。

明朝对朝贡的规定是很严格的，并非特别对朝鲜如此，其他国家弄不好就“以寇论”。如，明朝郑若曾撰《筹海图编》说到日本朝贡的情况时：“贡例：船止二只，人止二百，违例则以寇论”。“永乐二年，钦定每贡二艘，正副使等无过二百人。若贡非期，人船逾数，夹带刀枪，并以寇论。”^⑥

朝贡和拒绝入贡的政策隐含了明朝自大的内容。朝贡国自然感觉到屈辱。但是，为了保护朝鲜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万历朝时，中国援朝抗日，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却是超越屈辱感的事件。

万历朝鲜战争，又称朝鲜壬辰卫国战争。这场战争由日本前关白丰臣秀吉在1592年（壬辰年，中国万历年间，日本文禄年间）至1598年派兵侵略朝鲜、企图“超越山海而直入于明使四百州溶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丰臣秀吉致朝鲜国王书语）引起。朝鲜向中

^① 朱元璋为朝鲜定国号事，见《李朝实录》，太祖康献大王实录，元年十一月。新的朝鲜王赴明朝帝都朝觐、并回去后传朱元璋旨意和国号之事。“琳奉传礼部咨命，询国更何号，星辰来报。又传圣谕节该：‘我如今叫礼部與文书去，你回备细與他说：在前汉、唐、宋时，差官到尔国守御。差去者爱酒恋色，以致害民。尔国人便行致害，何益于事！为是朕不叫人去。尔恭愍王死，称其有子，请立之。后来又说不是。又以王瑶为王孙正派，请立之，今又去了。再三差人来，大概要自做王。我不问，教他自做。自要抚绥百姓，相通来往。’即日百官班贺。会耆老百官及于都堂，议国号。丙午，遣艺文馆学士韩尚质如京师，以‘朝鲜’、‘和宁’，请更国号，乞圣裁。按《明太祖实录》卷223载：闰十二月乙酉，高丽权知国事李成桂欲更其国号，遣使来请命。上曰：“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最美，且其来远矣！宜更其国号曰朝鲜”。

^② 《明太祖实录》卷221。

^③ 《明太祖实录》卷225。

^④ 《李朝实录》，太宗恭定大王实录，二年十月丙子。

^⑤ 《明史》，卷320，列传第二百八，外国一，朝鲜。

^⑥ 郑若曾：《筹海图编》，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174页。

国求援，明神宗应请求派遣大军救援，朝鲜将领李舜臣和中国将领邓子龙互相支援，最后都壮烈牺牲。但是最后中朝盟军最终获胜，朝鲜转危为安；日军主力被迫撤退，日本企图侵占朝鲜并以之为跳板进攻中国的企图破灭，丰臣秀吉也在希望破灭后不久死去。他死后不久，日本军队被迫全部从朝鲜撤退。

这是中国第二次保护朝鲜免受日本的侵占。李朝时期朝鲜对中国明朝的援助是一直讲究情义、感激涕零的。^①在当代韩国的官方历史叙述中，不提明朝援朝之事。^②当代韩国学者的论述，也是强化韩国历史上的自救卫国的英雄，明朝的作用在其历史书籍的表述中是弱化的甚至是混乱的。^③

而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数千年来即经常受到第三因素主要是日本的影响，无视这段历史是不尊重事实的。

朝鲜从与明朝的和平交往中不仅得到了安全，还得到了儒家文化。朝鲜李氏王朝时期将中国的朱子哲学思想定为国教，世宗大王在位期间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达到了文化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巩固了韩民族精神的基础，一直被后世视为学术与政治协调一致的模范而称颂和效法。

李朝中叶后，诞生了韩国儒学双璧退溪李滉(1501—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退溪号称“韩国朱熹”。在这些人的推进下，李朝李学达到了全盛时期。韩国人对历史上著名的儒者十分敬崇。在韩国还有许多企业支持或创办各类以著名儒家命名的研究所，研究院等，其中著名的如：退溪学研究院，栗谷研究会等。这些研究院对于推进儒学研究，形成社会尊崇儒家文化的氛围起了重要作用，说明传统儒家思想在韩国经济发展后的文化取向中，仍然居于一个极重要的地位。韩国的传媒也对积极宣传儒学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从2000年10月份开始，韩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长达100小时的《论语》讲座。每周2小时，历时约1年的时间。到处可见的宗族会，宗亲会，把散居各地的族人们连接在一起，体现儒家注重血亲血缘关系的伦理观念；各种各样的同窗会，同门会，是儒教不忘故旧观念的具体体现。^④

此外，明初，明朝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十分发达。除了边境的互市之外，明朝通过馈赠的方式（朝贡贸易），向朝鲜输出的物品主要是瓷器、绢帛，以及乐器、书籍和药材。但朝贡

^① 当清军于1637-1638年强迫朝鲜协助出兵攻打明朝的时候，朝鲜认为“与中朝有父子之义，一朝以兵刃相加，诚有所不忍”，（《李朝实录》，仁祖宪文大王实录，十五年三月己未），想方设法拖延征兵请求。朝鲜君臣上下皆认为：“本朝之于大明，君臣而父子也！服事二百余年，克谨不息，素称礼仪之邦，及遭壬辰倭乱（即1592年日本侵略朝鲜），车架西幸，八路丘墟，神宗皇帝动天下兵马，发内帑金帛，驱除廓清，掣而归之。国祚得延今日，皆帝力也！势穷力弱，虽不能守节，而乃敢称兵西犯乎？乃情义之所不忍为也。”说明朝鲜对明朝的忠心耿耿和感激之情。（《李朝实录》，仁祖宪文大王实录，十六年一月条）。

^② 可参见韩国驻华使馆网站关于韩国历史的中文叙述。

^③ 参见中韩建交时较早翻译过来的韩国历史书：姜万吉的《韩国近代史》。其中说道“正是李舜臣统率的全罗道水军的胜利，才拯救了朝鲜王朝。”又说“明朝竟不顾朝鲜政府反对，提出对日议和”，再说“明朝方面指定沈维敬负责议和谈判，沈即前往日本与丰臣秀吉进行交涉。由于日方提出割让朝鲜8个道中的4道等荒唐无稽的条件，致使议和谈判破裂。”姜万吉：《韩国近代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56页。

^④ 参见金坤坤：《“韩流”背后的民族文化》，《21世纪》2007年第2期。韩国以其“正宗”的儒学而自豪。比如，韩国人每年都要祭孔。韩国的祭孔仪式非常庄严，弥漫着祭奠至圣先师的氛围，政府也很重视，经常是教育部长以上的官员亲自出席。在中国台湾地区，人们也搞祭孔，也至少是台北市市长和“教育部长”出席。中国大陆最近也恢复了祭孔，但相比之下，旅游观光的色彩太浓，不够庄重，无法跟韩国比。参见《环球时报》对新儒学大师杜维明教授的采访，《环球时报》，2006年8月27日。

贸易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是政治行为而非经济行为，所得文化反馈也少。^①当然，出于国防战略需要，明朝也从朝鲜得到了战马。洪武年间（1368-1398），明朝总计向朝鲜购买马 30000 余匹（按中国的记载为 30443 匹，按朝鲜的记载为 34617 匹）。^②

虽则李朝和中国在历史上维持了和平友好往来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存在于朝贡体制之中，李朝朝鲜即便有感激，也为当代韩国的历史书写者所不能接受，这便是悲情历史观的真实写照。古代的中朝朝贡关系，不等同于近代西方列强与殖民地之关系。其根本区别在于中国不以灭其国家、占其领土、掠其资源为目的。这种本质区别被韩国方面刻意忽略。

四、被征讨、占领和殖民的历史记忆

晚清以来韩国遭受日本的侵略和屈辱，这些历史加强了韩国民族心理的受害者情结。近代的屈辱历史成为中国和朝鲜民族的共有的记忆。

1876 年，日逼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日本取得在朝鲜的特权。甲午战争中，清朝为履行保护属国的义务而于侵略朝鲜的日本作战失败，并导致日本侵略中国本土。根据 1895 年的《马关条约》，第一款明确规定：清朝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决”。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关系结束。

此后，日本占据朝鲜，朝鲜走上了殖民化之路。此为其最屈辱之历史阶段。韩国史学家说：“由于门户开放，在韩半岛地区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因为未能自觉建立起国民国家，想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过渡的主题转变也遭到了失败，可以说沦为殖民地是无法避免的。”“韩半岛是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角逐的地方，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与周边任何国家相比，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虽然为了根据有关国家之间的国际协定，使该地区永久中立化，从而维护主权，避免国际争端进行过活动，但韩半岛大部分政治势力，都分别属于亲清派、亲俄派、亲日派和亲美派，他们企图以强国为靠山，维持政权，结果终于走上殖民化的道路”。^③

1904 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日本得控制朝鲜。1905 年，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在朝鲜设立日本派出的“统监”政权。高宗被迫退位由皇太子继位。1910 年 8 月《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设立朝鲜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至此，李氏王朝正式终结。自 1919 年三一运动至 1945 年日本战败，朝鲜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独立运动。其间，中国给予朝鲜独立运动以极大的支持。在中国的支持下，朝鲜共产党人金日成领导的游击队在中国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活动。而成立于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先是得到中华民国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的支持，后又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几次迁移，最终迁至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同时，在中国政府帮助下，朝鲜复国运动人士在中国成立“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1942 年中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两支武装合并为韩国光复军，交由临时政府直接统辖。

晚清和近代以来的韩国历史和中国的关系颇多曲折。总的来说是一个脱离传统历史、走向独立自主的过程。其中，日本侵略后又实行暴力殖民的因素则对韩国现代民族心理的形成产生了屈辱感的影响。此外，朝鲜半岛分裂的状态也是加深并不断提醒韩国民族心理中危机和屈辱感等状态的现实因素。

^① 正如朱元璋所说，对于朝贡国而言：“所贡之物惟是表意而已，若事大之心永坚，何在物之盛。”所谓事大之心即指以对中国的朝贡和遵从为大事。中国关心的是政治关系。朱元璋：《谕安南国王诏》，《高皇帝御制文集》，《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 1995 年 7 月版，卷第二。

^② 参见林金树：《明代洪武年间中朝两国政治游戏中的官方贸易》，《大连大学学报》，2007 年 2 月，第 28 卷，第 1 期。

^③ 姜万吉：《韩国近代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年版，第 9 页。

五、地缘政治因素对韩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影响

常识判断,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和民族气质的形成是与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朝鲜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在半岛上完成的。背靠实力强大的大陆中国,隔海与日本列岛相望。半岛居于两强之间,其国家之存续必然受到两强的影响。忽必烈于公元1274年和1281年两次远征日本,均从半岛出发,因战舰之粗劣和台风的影响失败。而日本在唐朝、明朝和晚清的三次侵略大陆的过程中,均以朝鲜为首先打击对象。这种半岛经验会给朝鲜民族形成夹缝中生存的受害者情结体验,并对当代韩国的对外战略产生重大影响。韩国盛行“三国志”的研究,希望在当代韩中日、韩美中、韩朝中、韩俄中等一系列的三角关系中占据反客为主的核心地位,即是这种地缘政治的典型思路。^①

本文无法全面展开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特质的全面分析,在此仅指出一个受地缘政治影响深刻的特质。即韩国人的激烈情绪问题。在抗议政府进口美国牛肉和日本与其“独岛”(日本称竹岛)的民族情绪表达中,韩国人的表现居然上升到自焚和断指的程度。学者们把韩国的这种激烈的情绪释放特质叫做“半岛性格”。

对于同胞的一些激烈之举,主办在韩华人内部刊物《北京通讯》的韩国学者慎荣树先生说:“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这是韩国人面对危机时的应激反应。尤其是面对大国时,以韩国之弱小,一般的抗议是不会引起重视的。”在北大历史系读博士的李周美小姐说“韩国男人是激烈的,韩国女人也一样……为了国家,我相信韩国人什么事都会做出来。”而李元烨先生则将“急性子”命名为“半岛性格”。^②

有的学者认为,韩国既不是大陆也不是岛国,她位于二者之间,担负着桥梁和通路的作用,所以总是受到强大文明的侵入,这是宿命。在这种宿命的关系里,半岛人总是按强大国家的脸色行事,在顺从和反抗的不断往复中培养了既不是“大陆德行”,也不同于“岛国德行”的一种“半岛德行”。总的说来,这种半岛德行,有一些心灵上的封闭性,也有在主张自我的同时控制自己的心理,可以说是“泪水与笑脸”同在。还有对大陆文化的自卑与对岛国文化的优越感。^③

韩国的现代文化即是在半岛所特有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形成。其典型特征是吸收东西方三大文明成果。韩国学者认为:“韩国现代文化就是深厚的儒教伦理、日本的殖民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复合互补”。这三者“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融合,共同构筑了富有韩国特色的现代文化模式。”^④

这种吸收外国文明优秀成果的历史,在半岛性格因素的催化下,容易使韩国对本民族的身份认同产生强烈的敏感,甚至是过激的反应。它会使韩国对历史和文化的叙述由悲情主义转向英雄主义,相当固执的坚持文明的首创性和独立性。而中国作为对韩国传统文化产生最大影响的国家,对于韩国方面的提法和说法,同样因为近代以来历史悲情主义因素作用,产生强烈的反应。这是中韩双方在一系列文化-历史问题上产生强烈对抗的主要原因。

身份认同的争论

建交以来,中韩双方在中韩关系和韩国历史-文化问题上的争论,本质上属于韩国身份认同的争论。这些争论见下表:

^① 在笔者参加的2008年9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的一次中韩学术对谈中,韩国学者即持有典型的三国战略思维。

^② 《半岛性格,儒家文明——韩国学者谈韩国国民性格》,《南方周末》,2005年4月14日。

^③ 金文学:《“同一面孔”下的中、日、韩三国人》,原载《看世界》。<http://www.kxkcc.org/www/jikan21-18.htm>

^④ 催俊植:《对韩国文化的根本理解》,《当代韩国》2006年夏季号。

时间	争论内容	韩国举措	中国观点
2002-至今	檀君、箕子朝鲜、高句丽等相关韩国民族起源和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	尊檀君为韩国民族之起源。弱化箕子朝鲜的历史。高句丽历史为韩国历史。	檀君是神话传说。箕子朝鲜是历史事实。韩国对尊檀君而弱化箕子朝鲜，目的是确立其民族独立起源性。高句丽是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
2005年1月	“汉城”被改称“首尔”	时任首尔市市长李明博在市政府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把汉城市的中文译名改为“首尔”，“汉城”一词不再使用。	中国舆论认为是“去汉化”(De-sinicization)的重大举措。也体现出韩国方面的对话语霸权争夺。
2005年11月	江陵端午祭(Gangneung Dan-o Je Festival)	经过韩国的申请和活动，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	中国舆论分化：一派认为“端午祭”源于中国的“端午节”。另一派认为“江陵端午祭”是和中国的端午节完全不同的韩国传统节日。
1970-2005	汉字的使用问题	从1970年到1999年，韩国大量停止使用汉字。2000年解除对汉字使用的部分限制。韩国国内存在着激烈的反对势力。韩国政府2005年2月提出了《推动汉字并用方案》，宣布全面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中国汉字和汉字标记。	韩国无法割断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汉字和中国文化的联系。
1992年以来	领土纠纷	长白山天池、间岛属于朝鲜民族； ^① 黄海划界上坚持中间线原则韩国占了苏岩礁并将1月18日定为“离於岛(中国称“苏岩礁”)日。	中国与韩国在陆地上并不接壤，无领土纠纷。中国与韩国在苏岩礁不存在领土争端。但黄海存在划界问题。

^① 本文限于篇幅，不在具体的领土问题上一一举证。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朝鲜李朝时期是认同长白山为中国领土的。据朝鲜李朝《新增东国輿地胜览》(《新增东国輿地胜览》京人文化社，1978年版)，卷五，咸镜道庆源都护府豆满江：长白山：“女真语谓善颜阿林，以白色的山峰，故名，胡(女真)人奉之为神山。另据朝鲜《李朝实录》，肃宗大王实录，十七年十一月丙寅：“长白山，胡人(满族人)或称白头山，以长白故也”。金女真人定其名为“长白山”，传至今日，已有八百多年。《金史·世纪》记载，“长白山”一词，最早是由金世宗完颜雍最早使用的，即为后世满语称“果勒敏珊延阿林”。所以，李氏朝鲜建立初期，长白山(朝鲜称白头山)被视为域外之山，所以没有被列入国家正式的山川祀典中。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定界以后，长白山成为中朝界山。而边界在长白山以南。长白山被朝鲜民族朝圣是伴随着近代以来朝鲜民族独立的历史过程的。参见李花子：《李氏朝鲜的长白山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至于间岛，原名“垦岛”，位于图们江北岸，最初是指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光霁峪前的一处滩地。而目前的中韩争论中，韩国方面的“间岛”是指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的中国延边朝鲜族聚居地区，包括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市。该地区在历史上曾有过主权争议，1909年9月4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北京签订《中韩界务条款》，又称“间岛协约”，确定间岛为中国领土。中朝于1962年签订《中朝边界条约》，该约将本属于中国的长白山天池一分为二：54.5%属朝鲜，45.5%属中国。韩国学者不承认这些条约。

此外，在中医针灸、活字印刷、书法等问题上，也存在争论。^① 上述可以确认的争论中，除了领土问题之外，其他问题都属于所谓“软实力”的问题。其实质是，由于韩国构建自身民族身份牵涉到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认同，因此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关注。由于韩国在其民族认同问题上对历史的选择性叙述，导致中国认为其东亚历史文化的话语权地位受到冲击。而韩国方面自认为其行为与中国没有关系，这就使双方的观念冲突成为必然。那么，韩国民族身份的认同到底和中国有没有关系呢？或者说，一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和他国有没有关系？

“身份”是建构主义十分重要的概念。而构建身份恰恰不是某一个行为体在单位层次上单纯的自我设定，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互动与社会承认的结果。也就是说，身份的认同是具有社会性和系统性的。韩国的身份构建不能单纯的以自身的认定为唯一标尺。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和他方意见的正确回应，才是构建身份的必由之路。

当然，行为体的观念认同与身份认同是历史性的，即它会随着历史不同阶段行为体对利益追求的类型、目标和程度的变化而重新界定。^②因此，国家的身份（包括形象和特征）是随着国家间互动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国家间相互制造（建造）了国家，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③如此，韩国现代国家的缔造虽然在 1948 年独立后一直在进行，但是，由于其最大的邻国中国并没有参与这一过程（直到 1992 年），现在韩国是在重新把其新的、旧的身份诉求展示给中国，中国不应该为韩国的不同于中国的历史观和文化观而惊诧甚至发怒。韩国与中国的争论恰恰反应了中国和韩国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在现代民族心理和民族认同的重大核心问题上需要相互的磨合。

这里仅仅只涉及到中韩的双边关系。如果放宽视野，东北亚即是一个国际系统。这个国际系统等同于一个国际社会，它应该由一系列的规范支配。国家被从理性目标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得到塑造。^④而目前的东北亚缺乏一个清晰并且有效的规范系统。仅仅能够从传统主权至上的原则中梳理东北亚国家间的关系。换言之，中国和韩国均出于传统民族国家塑造和形成的阶段。这不得不令建构主义者觉得悲观。

主权至上的黎塞留原则源于欧洲近代国际关系，传统东北亚的国际体系是朝贡体制，跟不上就不存在主权意识。在近代以来的击碎过程结束后，主权至上逐渐成为该地区唯一清晰的国际社会规则。而对于东北亚国家而言，目前仍然处于一个对主权至上逐渐吸收、运用和适应的阶段。

主权至上原则首先表现为主权问题上的刚性，主权争夺是双边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中国与韩国和朝鲜在长白山天池、延边等问题上有争议，在黄海大陆架问题上有争议。而韩国在独岛（竹岛）上与日本的争议。争端双方均持有强烈的刚性原则。此外，主权至上还表现为民族主义情绪的普遍存在。而民族主义情绪则又纠缠了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清算过程。^⑤主

^① 除了本文表中所列的争论外，其他的争论目前存在一定的疑问。比如，2008 年 8 月 1 日的《朝鲜日报》对中国某媒体报道该报称“孙中山有韩国血统”的否定。来源：《环球时报》驻韩国特约记者沈松报道，2008-08-02；及东方网：《韩媒澄清从未报道过孙中山有韩国血统》。<http://news.163.com/08/0802/12/41BG01J80001124J.html>；其他如“日拒绝韩国要求，坚决不修改教科书中朝鲜是中国附属国”的报道（见网上评论）也无法证实。因此，鉴于目前的混乱局面，在无法确认的情况下，本文对其他一些争论不作为论据。

^②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78.

^③ Peter J. Katzenste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New York, p.75.

^④ Martha Finnemore, *N 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68.

^⑤ 1992 年 8 月 27 日，即中国与韩国正式建交的第三天，韩国的《东亚日报》就发表李基洪的文章《斑驳的过去》。文章说：“为了韩中间真正的友好睦邻关系，必须对两国近现代史上形成的曲折的过去进行清算，两

权至上原则的国际关系结果是追求结构上的均势状态。由此论之，构建新的均势结构是东北亚国家的主要战略目标。正如前文所述，韩国追求在多个“三国志”式的结构中“两面下注”的理想状态。但是，均势结构如果要稳定有效，就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力量上的基本均衡和价值观体系的大致一致。所谓“权力的均衡降低诉诸武力的机会；共同的价值观则减低诉诸武力的欲望”。^①力量在东北亚并不均衡，同时，鉴于中韩等国在历史观和文化观念上的争论，东北亚离价值观体系的大致一致也相去甚远。

总结

中韩双边关系自 1992 年以来经历了十多年的蜜月期后，开始全面审视对方。因为特殊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形态和中国对韩国的历史影响，双方处于“清算”过程中。而韩国在历史问题上处于发动者的角色，中国对韩国的行为是被动的。韩国的民族心理的形成还需要中国方面的合理回应，也就是说，中国承担了韩国现代民族国家心理形成的评判者的角色，中国也卷入了韩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历史进程。

从中国方面而言，承认和容忍韩国的现代化转型，也是自身民族心理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但中国考虑双边关系应该从更大范围比如东亚和世界的角度出发，这是中国和韩国的真实地位和国家抱负之不同决定的。中国的惊诧，来自长期的和韩国的隔阂，以及长期不在乎中国周边国家心理变化的历史性影响。要确立自然的、自在的双边关系，双方必须克服历史症结，而不是简单的建立某种战略均势。韩国的历史悲情主义是隐藏在民族主义之后的深刻的民族心理问题。如果不从历史价值观上逐渐冰释双方的纠葛，政治家们忙于建立的东北亚战略均势则会失去长期的有效性。

国问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数不少”。事实上，在中韩经过了十年的蜜月期后，目前处于清算历史的阶段。

^① 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 页。